

容闳与丁日昌

赵春晨

〔内容提要〕容闳与丁日昌都是近代岭南地区较早投身洋务运动、并在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们彼此间曾有很密切的交往。容闳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其近代化思想对丁日昌影响甚巨;而丁日昌作为握有一定权力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其支持和努力对容闳能否实现自己的主张也至关重要。从容丁二人的交往中,人们可以窥见 19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洋务派知识分子和洋务派官僚之间那种谋士与主事、理论家与实践者相互影响、同而又异的关系。

〔关键词〕容闳 丁日昌 交往 洋务运动

容闳在其自传式回忆录《西学东渐记》里,曾用相当篇幅述及他同丁日昌的交往,称丁为其“老友”及“志同道合者”,并且说:“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1〕}足见他对丁的赞赏和对此段友谊的重视。事实上,容闳与丁日昌的交往对于他们彼此来说,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容闳作为留学归来的、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接受过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其在洋务运动期间的一些重大倡议和活动曾得益于丁日昌的积极支持,其中特别是实现留学生赴美计划,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河,二人可谓同彪史册;而丁日昌作为洋务派的重要官员,其近代化思想和活动受容闳的影响甚巨,并进而影响到清廷的决策与整个洋务运动的进程。从容丁二人的交往中,人们可以窥见 19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洋务派知识分子和洋务派官僚之间那种谋士与主事、理论家与实践者相互影响、同而又异的关系。本文在此仅就容丁交往始末、容闳对丁日昌的思想影响以及容丁二人的异同几个问题作一些考察和分析。

一 容、丁交往始末

关于容、丁交往的起始时间,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的史料记载,但据有关资料来推断,当在 19 世纪 60 年代前期,即 1862 至 1865 年间。至于具体的时间,存在以下三种可能:

其一是 1862 年夏。此时容闳第一次来到设在安庆的曾国藩军营,虽然未同曾国藩本人见面,但是与曾的幕府中人曾有过接触。据曾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同治元年的日记记载:

“五月初三日，……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淳甫(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应其国贡举得隼，去年左孟星函荐予，属我引荐揆师)来。”^[2]而此时丁日昌作为曾国藩的幕僚也正在安庆(丁于1861年8月投入曾国藩幕府，不久即随湘军大本营进入安庆，1862年5月底曾国藩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拟派其赴广东跟随晏端书办理抽收厘金事务^[3]，尚未离去)，因此二人有相互结识的可能性。

其二是1863年冬。此时容闳已第二次赴安庆，并被曾国藩任命为出洋委员，回到上海，准备启程去美国采购机器。而丁日昌恰好也被李鸿章从广东调到上海，在李的手下“入参擘画”、“监制炮局”。由于此次容闳在上海逗留的时间有数月之久，采购机器的工作又与丁日昌所负责的事务不无关系，因此两人发生交往的可能性极大。刘学照先生在《丁日昌交往述略》一文中即认为：“丁、容相识，当在这段时期。”^[4]

其三是1865年容闳自美国采购机器回国之后。这时丁日昌已被任命为上海道台，并且兼任刚刚建立的洋务派大型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的首任总办，容闳回国后则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任江苏布政使衙门译员，驻节上海，他从美国采购来的机器也奉命并入了江南制造总局之中，容、丁二人此时不仅已有交往，而且过从甚密。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写道：“此时任上海道者为丁日昌，与予交颇投契。”^[5]即是明证。但容、丁二人是否此时方才结识，却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订，因此也只能作为三种可能情况中的一种。

关于容、丁二人何时结识虽然难下定论，但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的密切交往却是不争的事实。丁日昌任上海道期间，容闳与他的交往已如上述，不久之后(1865年10月)丁日昌升任两淮盐运使，容闳更“随至扬州”，在丁的手下工作了约6个月的时间^[6]。1866年4月丁日昌被朝廷派往广东办理英领事入潮州城纠纷案，容闳仍回上海就译员旧职，二人分开了半年多时间。次年2月，丁日昌升任为江苏省布政使，1867年再升为江苏巡抚，容闳复又成为丁的部属。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丁的驻地在苏州，容闳的主要工作地点在上海，但二人公私两方面的交往联系都很频繁。容闳《西学东渐记》里曾忆及他几次到苏州拜谒丁日昌的情况，其中包括他请丁日昌向清廷提出组织华商轮船公司和派遣青年出洋留学等^[7]。丁日昌还居间帮忙，介绍一位郑姓姑娘与容闳结婚，组织了家庭^[8]。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丁日昌奉命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理教案和中外交涉，容闳又被丁日昌电召至津，充当随员，并“与闻未后数次之谈判”^[9]。容闳还借此机会，通过丁日昌再次向曾国藩提出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建议，终于获得了曾的赞同，为实现其留学教育计划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可以说自1865年后的五、六年间，容闳基本上(直接或间接)都是在丁日昌手下工作，两人联系密切，相交甚深，曾共同筹划过洋务运动的一些重大举措。

1871年1月丁日昌因母丧离开江苏巡抚任，返回家乡潮州府，此后几年丁日昌居于潮州揭阳，为母守制，1875年后复出为宦，先后担任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等职，晚年抱病在乡，至1882年去世。而容闳则于1872年被委派为留美学生事务所副监督，1875年又被任命为清政府驻美国副公使，主要居于美国。他们二人天各一方，再未能在一起共事，目前也未发现两人曾再次相聚的直接资料。但据有关的历史资料显示，容闳在1873年短暂回国(为联系购买美国新式武器格林炮事)期间，很可能曾到揭阳拜访过正在守制中的丁日昌。1873年11月李鸿章在致丁日昌的书信里曾写道：“莼甫(按：即容闳)西还，为炼

铁购炮诸事, 闻将顺道往谒, 可询其详。”次年春李鸿章给丁日昌的信里又写道:“莼甫计已过谒。”^[10] 如果这次拜访确实进行了的话, 当是容、丁二人的最后一次晤面。

二 容闳对丁日昌的思想影响

容闳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 其近代化思想在当时无疑处于领先的地位。他的这些思想, 曾对丁日昌产生很大影响, 并通过丁日昌对清廷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洋务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兹举其要者如下:

(一) 建立“机器母厂”的思想

容闳于1863年在安庆初次拜见曾国藩时, 就提出了建立“机器母厂”的主张, 认为“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 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 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 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 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 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 然后乃可发生多数之子厂”^[11]。这一思想对丁日昌影响颇大。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 丁日昌曾多次向李鸿章、曾国藩等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基础工业的问题: 如1865年创建江南制造总局时, 丁日昌在给李鸿章的禀报中即写道:“有一制器之器, 即可由一器而生众器, 如母之生子, 子之生孙。流传既广, 则学习易精。”^[12] 由他主持拟订的该局《开办章程》, 虽根据清政府和李鸿章的指令, 确定当务之急“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 但也表示将来需要“试造”轮船和“考究”铸钱、织布、挖河、犁田诸器^[13]。1868年, 丁日昌在呈递给曾国藩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里又曾建议:“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 每一制造局分为三厂: 一厂造轮船, ……一厂造枪炮、火箭、火药及各军器, ……一厂造耕织机器。”^[14] 可见他心目中所要建立的“制造局”, 乃是能够造出各种机器的“机器母厂”, 而非单纯的军火厂或造船厂。这一思想, 显然是得自于容闳的影响。

(二) 开辟中国留学教育的思想

容闳早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时, 就已产生开辟中国留学教育的思想。回国之后, 他坚持不懈地为其派遣留学生计划而奋斗。容闳的这一思想主张, 极大地吸引和影响了丁日昌。容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最初就是向丁日昌提出的。丁日昌对容闳的计划“大赞许”, 不仅代其上呈条陈给军机大臣文祥, 而且多次向曾国藩、李鸿章等直接面陈, 最后终于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获得曾、李等洋务派大员的同意, 联名向清廷上奏, 促成了容闳计划的实现。容闳《西学东渐记》里记述这一段历史事实道:“(处理天津教案) 钦派四大臣中, 曾文正实为领袖。当诸人未散时, 予乃乘机进言于丁抚, 请其向曾督重提教育事, 并商诸其他二人。予知丁于三年前已向曾督及此, 故曾当已略知此中梗概, 丁又素表同情于予, 得此二公力助, 余二人当无不赞成矣。一夕, 丁抚归甚晚, 予已寝。丁就予室, 呼予起, 谓此事已得曾公同意, 将四人联衔入奏, 请政府采摘君所条陈而实行之。予闻此消息, 乃喜而不寐……。”^[15] 从中可见丁日昌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丁之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积极态度, 首先是在思想上接受容闳影响的结果。联系到丁后来在担任福州船政大臣期间, 积极支持派遣船政学堂生徒赴欧留学, 可以说都表现出了容闳这种思想影响的存在。

(三) 发展新式航运业的思想

容闳对发展中国新式航运业十分热心。他于1867年6月在上海发起筹组华商轮船

公司,后来又曾通过丁日昌向清廷呈递条陈,提出:“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欲巩固公司之地位,并谋其营业之发达,拟请政府每年拨款若干以津贴之。……将来漕米即运以汽船装运。不独可免沿途之损失,即北方数百万人民仰漕米以为炊者,亦不至常食朽粮也。”^[19]容闳的这些主张和活动虽然当时未能获得批准和实行,但对丁日昌也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影响。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内,积极倡导和组织轮船运漕,鼓励华商购买、使用新式船只和筹组轮船公司。他曾一而再地向朝廷以及有关官员发出呼吁:“多办轮船,一可收回利权,一可精习水战,断断不可拘牵时论,致失时机。”^[17]“轮船公司一举,本属自强嚆矢。”^[18]“为将来长久之计,舍设立轮船公司一层,此外别无办法。”^[19]后来他还自己集资,购买了一艘轮船,往返上海、汕头之间进行营运。这些言行与容闳的影响有一定的联系。

(四) 对基督教及教案的认识

容闳是一名基督教徒,他在美国芒松学校求学期间就已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并终身保持这种宗教上的信仰。但是容闳对于外国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在1868年请丁日昌转呈清廷的条陈中即提出:“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盖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谋之象。苟留心一察天主教情形,即可知予言之非谬。彼天主教士在中国势力,已不仅限于宗教范围,其对于奉教之中国人,几有管辖全权。教徒遇有民刑诉讼事件,竟由教会自由裁判,不经中国法庭审理。是我自有之主权,已于法律上夺去一部分也。是实不正当手段,若不急谋防范,则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故政府当设法禁止。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20]丁日昌一生经办了大小多起教案,他对基督教的认识以及处理教案的方针都深受容闳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增多(很多应是得自于同容闳的密切接触),他已开始自觉摒弃中国传统士大夫对于基督教的某些愚昧偏见和盲目仇视的情绪,不再简单地将基督教视为有“淫心兽行”的邪恶团体,而能够以比较平和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西方宗教;另一方面,他又强烈谴责外国教会在华的侵略活动,并力谋加以抵制。丁日昌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在他帮办天津教案过程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天津教案发生后,丁日昌在给总理衙门的信里写道:“教堂挖眼取心一层,大概皆系民间以讹传讹附会之说。缘法国传教心虑甚长,其教士皆改装中国衣服,无处不到,无地不有,以小忠小信小利煽惑愚人,使阴坠其术中而不觉。……是大可虑者,该教士取千万人无形之心,挖千万人无形之眼,至于挖取一人一眼和药之事,必系中国奸民所为,事发则嫁名彼族以纾祸。若谓该国专心致志为此浅露害人之事,似可断其必无。”^[21]在天津期间,他上奏清廷,指出教案是由于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使得“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亡’之愤”所激起,天津官民“过出有因”,请求朝廷对有关人犯的罪名“量从宽减”,同时他建议朝廷同法国展开外交谈判,“议明教士不准滥收莠民、干预词讼”,以解“教务隐忧”^[22]。前已述及,天津教案期间容闳正担任丁日昌的随员,从丁的上述言行中人们不难看到容闳的影子。

(五) 护侨思想和侨务观念

容闳作为从海外归来的人士,对西方殖民主义者贩卖华工的累累罪行、华侨华人在海外的艰辛以及他们爱国思乡的感情有深切的了解。他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曾回忆道:

“当1855年,予初次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辮相连,结为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23]容闳在同丁日昌的交往中,也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与认识,成为丁日昌护侨思想和侨务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1867年,丁日昌在上呈曾国藩的《自强变法条陈》中,就已提出派使“赴各国有华人处所”,以保护华侨和招揽人才的主张^[24]。此后他又多次向总理衙门以及有关官员发出呼吁:“华人之寄寓东西南洋各国者,不下百万生齿,若随时保全维系之,非唯上遂天地好生之心,而且有裨异日中外交涉之大计。”^[25]“新加坡、新老金山、古巴诸处,粤闽流寓多者数十万人,少者十余万人,因无华官镇抚,夷人直鱼肉视之。今若设各领事而统以一星使,初数经费当出自国帑,迨稍习则就地筹费绰然有余,而以其间求技能、购军火、储财用、刺情伪、收人心,……固亦我国家保民绥远、反客为主之至计也。”^[26]1875年丁日昌在担任中秘换约钦差大臣期间,更直接利用容闳赴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的报告,同秘使爱勒谟尔展开谈判,揭露了秘鲁公然践踏中新订《友好通商条约》中关于保护华工的条款,虐待、残害华工的事实,要求秘方作出切实承诺,保护华工。丁日昌在同李鸿章联名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写道:“秘鲁、古巴等处专以贩卖人口为生计,与中国别无通商之事,从前尚未深悉该处凌虐华工情形如此真切,尚可含容将就,自陈(按:陈兰彬)、容(按:容闳)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悉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自尽者每日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今若不于照会内割切议明,即含混与之换约,则是从前既往之华工不能使生,而随后复往之华工又将就死,而十数万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无来苏之望矣。”^[27]在中方的坚持斗争下,终于迫使秘方作出保护华工、除去弊端的保证,在秘华人的状况有所改善。这次胜利是容、丁等人合作的又一成果,亦可见容闳对丁日昌的思想影响。

三 容、丁之异同

从以上所述容、丁的交往过程和容闳对丁日昌的思想影响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共同性:政治立场上,二人皆为爱国者,都希望能够通过清政府的“自强”努力,达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以抵御外国的侵略和奴役。而且二人皆效力于清政府。丁日昌不消说,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对清廷可谓忠心不贰;而容闳虽然不满“中国之腐败现象”,甚或“深恶满人之无状”,但他当时的主导思想,还不是反清,而是“依一定之方针,循序渐进”,以达到他“夙昔之希望”,即实施教育救国的计划^[28]。所以尽管他曾到太平天国献策,最终还是投入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属下,接受了清廷所委任的官职。从思想认识上看,容、丁二人这时都主张向西方学习,认为只有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因时变革,方能使中国达到富强的目标。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写道:“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29]丁日昌在《代李伯相上总署论制造火器书》中写道:“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章句小楷之积习,以致所用非所言,所言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举国视利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千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今幸而流入中

国,足资滥觞,苟能由浅而深、由粗而细,安见西人独能以船坚炮利称雄海外也哉!”^[30] 足见二人在主张向西方学习这方面“志同道合”,这也是他们能够相互合作的思想基础。

然而容、丁二人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就政治立场言,容闳虽然服务于清政府,但又有相当大的游离性。在投向清政府之前,他曾“表同情于太平天国”。在他 1860 年访问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的七条建议中,已经包括有在中国组织一个“民政政府”^[31] 的要求。这一政治改革要求虽然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未曾再向清廷方面提出,但是容闳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他对当时清廷所给予的官职实际上也并不看重,更多的精力是用于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例如译书、经商、办报、推进留学教育计划等等。因此容闳同清政府之间又只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松散关系,这同深深陷足于封建仕途、效愚忠于清王朝的丁日昌是不相同的。就思想认识言,容闳接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在美国居住多年,真切地观察和感受过西方文明,他对西学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思想的开放,又非丁日昌等仍然抱持传统儒家政治与伦理观念的洋务派官僚所可比。丁日昌当时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仅局限于枪炮器械、机器生产和部分经济与文教制度的引进,对于政治领域的改革、深层次的文化融合,则抱反对的态度,认为:“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必须效法泰西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庶可以我之正气靖彼之戾气,不致如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为有识者所窃笑也。”^[32] 而容闳虽然在洋务运动期间不曾明确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但他所希望灌输于中国、“改良东方之文化”的“西方文明之学术”,当不仅限于丁日昌所言的范围。也正因为如此,容闳后来在担任留美学生副监督、驻美副公使期间,会因支持留学生的“西化”行为,而遭到清廷上下、包括一些洋务派官员的众多非议,成为其留美教育计划中途夭折的一个导因。

由于丁日昌去世较早(1882 年病逝),容、丁二人交往当日虽在政治立场、思想认识上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却还是同大于异,故此二人可以结为良好的合作伙伴,并分别以谋士与主事、理论家与实践者的身份,同属于洋务派营垒之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容闳的思想得以不断前进,政治立场也渐生变化,不再依附洋务派官僚和清政府,从参与维新最终转向支持共和革命。这种变化,从容闳来讲,并不奇怪,因为他早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而从丁日昌来讲,却是始料所不及,也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容闳与丁日昌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的交往与合作又只是一种同路人的关系,并非完全的“志同道合”者。

注:

[1][5][6][7][9][11][15][16][20][23][28][29]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 85 页;第 84 页;第 85—88 页;第 90 页;第 75 页;第 90 页;第 86 页;第 87—88 页;第 98 页;第 31 页;第 23 页

[2]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转引自李喜所《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第 89 页

[3] 曾国藩:《拟派办理广东厘金各员片》,《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 2225 页

[4] 张磊主编《丁日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第 343 页

[8] 李喜所:《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第 99 页

[10] 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见《丰顺文史》第 2 辑,第 75—76 页

[12] 丁日昌:《丁禹生政书》(上),第 178 页

[13]《洋务运动》(四),第 13 页

[14] [17] [18] [19] 丁日昌:《抚吴公牋》,卷 25,第 8 页;卷 13,第 1 页、第 6 页;卷 32,第 7 页

[21] [22] [24] [25] [26] [27] [30] [32] 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 6,第 17 页;卷 7,第 2—3 页;卷 4,第 7 页;卷 5,第 23 页;卷 7,第 22 页;卷 8,第 2 页;卷 2,第 24 页;卷 7,第 19 页

[31]《西学东渐记》中译本译作“善良政府”,日译本译作“文官政府”,此据袁鸿林《容闳述论》,见《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1 辑,重庆出版社,1985,第 241 页

Rong Hong and Ding Richang

Zhao Chunchen

Abstract

Rong Hong and Ding Richang were both significant figures of Guangdong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who, from the early beginning, participated in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later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it. As on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who received systematic Western education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Rong Hong's thought of modernization had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at of Ding Richang, while the supports and efforts of Ding Richang, a man with some local power, were quite important to the realization of Rong Hong's ideology.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Rong and Ding, one can discover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ernized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ernized bureaucracy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1860s and 1870s. This relationship was in f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Keywords: Rong Hong; Ding Richang; interactio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上接第 10 页)

Managerial independence of the state—owned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

Ren Daowen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four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eform towards managerial independence of the state—owned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 i. e., property right,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enterprise's dependence o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realized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for its own profit and loss. The paper then analys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offers related measures for their solution.

Keywords: state—owned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 independence; property right;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existing problem; reform measure